

关于学科建设的一次谈话

2003年2月15日

费孝通

我最近一个时期常常思考关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前景这个问题。在社会发展变化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过程中，跨文化跨学科的问题日益突出，我们需要跟上时代，把眼界发大些，不要固守现状来看问题，或许能把学科发展的路子走的更宽阔和稳扎些。今天先谈谈我一些初步想法和他们的来源。我的想法总的说来是想有关认识人的知识，统一在一个学术领域里。我具体地说把社会学搞成一门做人必需的知识知识的汇总。下面说说我这种想法的来源：

解放初期，我在清华大学当副教务长，当时面临大学改造的任务，在思想改造、教学改革、行政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问题。我曾就遇到的问题和所做的工作，写下了经验和意见，编成《大学的改造》一书，其中“社会学系怎么改造”和“我们的大课”两篇文章详细讲了当时社会学怎么办和大课怎么上的意见。当时领导上正在酝酿取消社会学系，原来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园地应当怎样处理，我当时的立场是不能反对取消社会学，但是如果据盯取消了这部分的学术领域怎样办成了一个问題，所以想用改造来代替取消。

当时清华、燕京、辅仁三校教授代表共同讨论关于社会学改造的问题，总结中有这样一个初步结论：

“我们共同认为今后社会科学的基础就是马列主义，所以不论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及哲学均应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们都不过是在这共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重点。因之，原有各系完全分别独立的情况是不易维持的，今后应当沟通各系，逐渐实现一个社会科学院，现有各系将要成为这学院里的重点。在这个时候，现有社会学系课程主要的将成为该院的基礎课程，凡有专业性的课程可以成为该院重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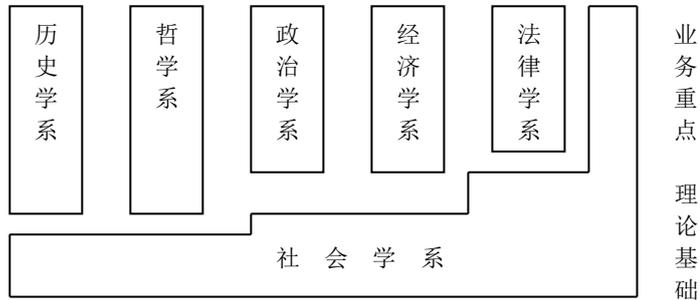
“目前法学院及文学院之一部分归并为社会科学院的条件尚未齐备。当其他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系尚分别存在时，社会学系亦无先予取消的需要，而且正可以社会学系为基础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并为将来社会科学院做筹备工作。”

这段结论的意思是现在的社会学系在将来社会科学合并为一个单位时，所处的地位不尽同于其他各系。简单的说，他将分为若干部分，其主要的一部分是成为新单位的基础部分。其他各系各有其专门性的重心，而原有社会学系却并不象其他各系那样显著的专业性。社会学系在供给新单位的基础课程外，所留下的一部分，在现在尚不是主要部分，可以加以发展成为新单位中的重点之一。下列的图表示现有各系进入新单位，或称作“社会科学院”所占的地位。

那时大学里开设的政治课，普遍称为大课，就是教员和学生共同参加，互助相长，来改造自



己的教育工作。普通称它作大课，因为这是全校学生，一部分教员以及职工工友一起上的课程。其实这只是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在进行着改造教育的一部分。



“大课是有系统、有组织的正规政治教育课程。……那时的高教会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各大学全校共同必修课，而且明确的规定了这一课程的任务是在改造思想。”“改造自己是要自觉自愿，大课，包括教员的指导，只是加强‘改造自己’的条件。教员和学生团结起来，互助相长，一道改造。”

我当时参加过社会学改造的讨论，也正担任讲大课的主任，受到这些意见和做法的启发，我曾经设想过，社会学的知识可以设成一门大课，专门讲做人的基本知识，即怎样“做好社会的一个公民”，公民教育从社会学入手。也就是说基本的公民教育就由社会学来完成，每周安排一两次。这对于大学生对社会、文化有一个全盘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后来社会学被取消，但这种综合性的基础知识是不可少的，哪怕不用社会学的名字，也应设法保留和设课。而现在就是有社会学专业，作为如何做人这样的基本知识也还要设为通选课，无论文科理科的学生都应该上。

以上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是我在上大学时看到美国的很多大学都为学生编写各学科的总论性的教材或称读物，各自全面介绍本学科，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看了以后感觉很激动，似乎对大学理应掌握的知识很快又一个概貌性的认识，既促进求知欲也启发年轻人去思考问题。因此我后来常想到在我们的社会学教育中如何吸取这方面的经验。现在我进一步想到当我们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应有一套这方面的知识通论，这也是当代学生进入大学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对一般公民也有用。社会学是否也应包括在此项任务之中。

第三个来源，是我在写重温派克社会学，写《补课札记》的“欧战期间的派克老师”时提出来的。

“1917年4月6日，派克老师正在芝加哥大学里准备社会学课程的教材，美国政府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的阵线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规模的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空前的。久处太平日子的住在美洲大陆上的人们如梦初觉，海外战争从天而降”。

这是成立未久的美国社会学会通过它的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向130个社会科学家发出了一个通知，征求他们对在这个大战中社会科学应当做些什么的意见。派克老师趁这个机会发表了他对社会科学战后发展的方向的意见，也是他进入社会科学阵地之初的一项重要对社会科学前途的表态。这里讲的话，在我看来至今还是适用的，尽管现在离第一次大战的结束已有近一个世



纪了。他说：

“世界战争对社会科学不会不发生影响。原有传统的思想意识已受到震动，甚至已经动摇了。这似乎是件小事，但是在我看来传统分立的各种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在 1918 年春天前后将要彻底的崩溃了”。

“过去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同一的问题，今后他们势将用相同的语言表达他们见解，而且可以取得相互理解”。

“过去各学科的分立其实来自英国，并不是欧洲大陆传统。它继承了英国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自从工业兴起以来，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成了相互竞争的对立体。国际性的战争已改变了这种情势。人们对国家的要求已不仅为保障个人间的自由，而要他实现社会的公平。这就引起了一大堆新问题……”。

战后我们将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再象过去一样盲目地任自然力量的推动，而必须对历史的进程加以人力的控制。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主人，首先必须理解这些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任务。

以上这段话，我觉得他明确地把社会科学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历史进程是客观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实体，社会科学是人们对这实体的理解。人们主观上的认识和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实体的关系必须说清楚了。派克老师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启示，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启发给人的一种自觉。社会科学应当建立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上而且为人们的生活作出指导，这样人们才开始做了历史的主人。这是对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也可以说是为社会学的功能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派克教授在那时就具有了打破学科界限的看法，虽然第一次大战后并未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又加深了这种认识，不过由于教育的职业化和学科的专门化，各自分门立户已成为 20 世纪的传统，并深入到了大学教育制度中，要想改变涉及面太大了，动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发展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各学科更不需要分开了，这将是一次巨大的知识革命，知识的继承已不能按技术的专业化来进行，必须从培养一批沟通各学科的学者入手。

现在的社会学的基础是一个实证主义的，20 世纪以来我们研究的问题都是能看得见，摸的着的，是能够用数量表示，可以测量的，而数量化正是科学的标志。但这种实证主义限制了我们对人的研究的深入，流失了一部分人之为人的心灵问题。这是人的知觉中的最高的层次尚未语言化的一层，因为没有进入语言范围，没有进入符号体系的一层，所以很难表达出来。这一层也正是人与动物不同，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主要的一层。这是人们留给了艺术家和哲学家的活动范围。

深入一步看，正是这决定人之为人的关键部分，还进不了社会学观察的范围，社会学尚没有方法来研究这一层次的问题，我们还只能用“言外之意”、“一见生情”等这一类词汇来形容人生活中很重要的这一部分，或用“命运”“机遇”来解释这些现象，尚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表达。

因此我们说人的研究，即人本身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主要从生物体的机体活动和心理活动来研究，如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成就，有些尚有争论，不能被公认为科学成果。当然我们要抛开



原有公认的“科学范围”，实证主义的范围，现在一下子做不到，但人类本身的知识问题，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如何把宗教的，艺术的心理活动科学的表达出来，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学研究的现阶段，还是实证主义基础上积累和形成的知识，还不是人的研究的中心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所做的也是认识人的研究的一部分，但非中心部分。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各学科要打成一片，人文社会科学今后都要合在一起，只是要大一统，一下子达不到，只能一步一步来，能做多少做多少，或许有什么机缘会发展和改变得快一些。而现在只能借了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研究的成果，尽可能补充心灵方面的材料，间接的反映这种事实，逐步的探索和深入进去，实际上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结合。

（本文由潘乃谷根据 2003 年 2 月 15 日谈话记录整理，并经费先生修订）

【译文选载】

对于人脑来说，族群是生物“物种”吗？¹

——存在于我们对某些社会类别的认知当中的本质论

弗朗西斯 J. 吉尔-怀特

摘要：如果族群行动者将族群表征为本质化了的“自然”群体——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族群的“本质”（essence）并不存在——那么，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会如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假设与证据，即由于族群在表面上有着与物种相似的特性，使得族群行动者们把那些原本用来对物种水平的类别进行加工操作的心理模型输入到“活类型”（the “living kind”）当中来，结果，当人类看待族群（以及其他几个相关类别）时，好像它们便是“物种”一样，这种看法带有与此相关的本质论的论调。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相似性包括：（1）以类别为基础的内部通婚；（2）以继嗣关系为基础的成员身份。进化促成了这一认知性的偶发事件，因为将族群加工成物种——至少是在祖先所生存的环境当中——解决了与相互区分和行为预测有关的适应问题。同族群的人（就像同物种的成员那样）共有许多初看起来并不明显但却高度相关的“特性”[对于相同族群来说，这些特性即规范（norms）]。因为不同的族群存在着不同的规范，其成员之间的协同合作常常失败，所以，同外族群成员进行交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由于这个原因，从适应的角度来看，把族群视为物种便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区分，使其更趋向于在群体内进行交往（其中，重要的一点即群内通婚）。它还促进了有用的归纳概括的发展，这使得人们无须与外族群成员进行太多成本很大的交往，而可以获得对其行为加以预测的可靠知识。本文回顾了认知科学的有关文献，并援引蒙古的认知性现场实验及民族志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设。

1. 引言

¹ 本文原刊载于美国《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 2001 年 8 月-10 月期（Volume 42, Number 4）。

